

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 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

——基于南京市 561 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张海波 童 星

提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获得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过程。本文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通过对南京市 561 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他们的自我认同失调,即大部分失地农民尚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主要原因在于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时间性”效应导致自我认同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的搬迁,“空间性”效应带来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阻碍了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尚待进一步检验的一个命题,即“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其社会参照系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

关键词: 被动城市化 失地农民 自我认同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乡结合部的大量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数量激增。1987—2001 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3394.6 万亩,按人均耕地不足 0.7 亩计算,每征用 1 亩地约会造成 1.4 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全国至少有 3400 万农民因此失去土地。^① 目前,世界城市化水平为 47%,发达国家为 75%,我国为 39%,若达到 50%,2000—2030 年的 30 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 5450 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 7800 万人(韩俊,2003)。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 1/3 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 60% 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发达地区局部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陈立新,2004)。因此,失地农民研究极具实际价

^① 按照这种方法推算,全国因征地造成的失地农民超过 4700 万,而目前各界引用的数据均为至少 3400 万,这可能是比较保守的估计,特此说明。

价值和战略意义,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与和谐。

国外直接针对类似中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研究较少,从相关文献看,有两个方向的研究可为借鉴。一个方向是集中于土地、农民与城市生活关系方向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土地是一种独特的财产,寄寓了农民的一种特殊情感和价值。R.莱德弗尔德强调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Redfield, 1956: 112)。H.孟德拉斯指出:“农民的土地恋是文学经常重复的主题……总而言之,整个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和的政治的系统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财产”(孟德拉斯, 1991/1984: 8)。二是城市之于农民的意义——城市人与乡村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如强调:“大都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齐美尔,转自康少邦等: 1986: 9)。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已经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农村人的思想方法则是自然主义的,幻想式的”(帕克等, 1987: 269)。沃思进一步将人口数量、密度与异质性称为城市性的生活方式(Wirth, 1938)。

另一个方向来自移民研究的相关讨论。如从类型学、社会结构变迁与行为分析等视角,探讨移民迁移的动力、模式、安置政策,移民心理及其社会适应,移民社区整合和移民社会发展等问题。托马斯与茨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运用报刊和书信等资料研究了波兰农民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认为“移民的结果是个人同家庭和社区相分离,它激发了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托马斯、茨纳涅茨基, 2000/1918: 56)。

国内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多集中于拆迁安置、土地补偿、权益保护、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失地农民就业差,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非农化意愿并不强烈,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葛金田, 2004; 贺金花, 2003; 成得礼、董克用, 2004; 汪晖, 2003; 朱明芬, 2004; 李一平, 2004; 张汝立, 2004; 浙江省人民政府课题组, 2003)。综合来看,目前的分析多集中于宏观描述,少有微观体察。

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失地和进城,这两个过程涉及到比外在空间迁移更为深层的内在心理变化。“农民”是一种职业和身份,是对自我的界定,因此,没有什么社会学概念比“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更能深刻反映这种心理的变化。自我认同被视为个人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

况的综合反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泰勒,2001:37)。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意味着对自我的重新界定,即对于“我是谁”这个重要问题的重新回答。换言之,失地农民在失地和进城的社会情境中,面临重新找回“自我”的社会位置问题。而现有的一些研究集中于以城市化及现代性适应为视界的行为选择问题,对失地农民依靠怎样的社会系统(包括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参照系统)及其互动结果则少有经验研究。然而,“个体生活中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相反,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吉登斯,1998:35)。

本文试图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透视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带给失地农民的心理震荡及其选择实践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迫使“失地农民”告别其熟悉的传统乡土社会而面向一个陌生的现代城市社会,其选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具有非自愿性;同时,这种非自愿性选择,又是以城市适应性和人的现代性为规定和约束的。因此,我们希望借助此项经验研究,探讨并回答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因城市发展而被征地的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过程中自我认同的转换机制是怎样的?我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操作的:1. 失地农民对于目前身份的认同。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讨论农民的心理认同仍然无法对几千年的传统心理置之不理。2. 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这是他们对“城市化”和“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对进城以后的生活采取何种态度,是积极融入还是消极逃避?不同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过程。3. 失地农民的群体位置。参照群体的改变通常会引起自我认同的变化。失地农民在进城后,作为参照群体的他群体和我群体发生了变化。

以上三者中,前两者是从“时间维度”考察和分析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和现代性的获得过程,第三者则是侧重于“空间维度”的考察和分析。以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多以“时间”定位来观察和探讨传统身份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现代性获得与适应问题,而“空间”定位的分析则显示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社会实践结果及其影响。本文拟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尝试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结构

变迁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计划与市场的二元体制之下，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多种所有制并存，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的自由原则和计划的指令方式来解释如此大规模的、被动城市化的农民流动。这也决定了本文分析视角的交叉性和多层面。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假设的提出与研究架构

在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吸力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推力而造成的“民工潮”，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流动农民；二是政府行政命令主导的征地所造成的失地农民。这两类群体虽然有诸多差异，但实质相同，都是城市化推进的后果。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前者的城市化是个人的自愿选择，后者的城市化是政府的安排而不论其是否愿意。因此，流动农民的城市化行为选择可以称之为“主动城市化”，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行为选择则是“被动城市化”；前者符合市场自由选择的逻辑，可谓“主动城市化群体”，而后者遵循政府行政主导的逻辑则可视之为“被动城市化群体”。

已有的关于流动农民的研究表明，流动农民往往结伴到同一所城市打工，“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翟学伟，2003），这表明流动农民“主动城市化”过程中，有一个反复权衡和情境模拟的过程。先适应下来的农民工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他们关于城市招工的信息和打工生活的描述往往成为跃跃欲试者的重要参考，而后者会根据这些描述对未来的打工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了解，在选择进城之前在心理上对于城市生活会有一个模拟和调适的过程，“老乡”及其经验就成为流动农民城市化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参照系统，借助“老乡”的经验则成为一个基本的心理调适过渡机制。作为“被动城市化群体”的“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的经验及路径则与“主动城市化群体”的“流动农民”有所不同。这两个群体在个体层面的另一主要差异在于，流动农民还可以再回到农村，失地农民则不能；进而言之，流动农民的自我认同有一定的弹性，而失地农民则没有。

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中心假设:自我认同失调假设,即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自我认同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和弹性,将导致自我认同失调。

为进一步研究被动城市化对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影响,本项研究提出两条具体的作用机制假设:

假设 1: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时间性效应假设(时间延迟效应假设)。认同换位的重要研究者梅恩斯(D. Maines)认为,人们由于认识到他们将要搬迁,他们在物质迁移之前进行认同系统的转换。这似乎只适用于“主动城市化”情境下的群体及其行为选择,而在“被动城市化”情境下,迁移的心理过程恰恰相反。失地农民并没有像流动农民那样做好进城的准备,对于他们而言,认同系统的转换落后于物质的迁移。更可能的是,“迁移活动在心理学上分为两个阶段,搬迁和投入。投入过程涉及到个人由‘陌生人’变成‘正常参与者’的变化”(康少邦等,1986:179—181)。由于“搬迁”和“投入”的时间差,失地农民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第一个机制假设: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的过程中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系统的搬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自我认同将逐步完成转换。

假设 2: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空间性效应假设(相对剥夺效应假设)。被动城市化还会带来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有的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如意,由于并非主动选择,他们不会将原因归结于自身,而会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安置补偿政策和当地政府,其相对剥夺感十分强烈。基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机制假设: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由于参照群体的改变,他们会感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自我认同的转换也因此受到影响。

由此,本项研究架构如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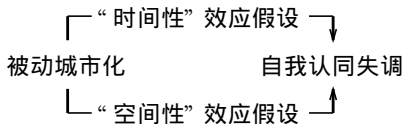


图 1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研究架构

(二)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

认同(identity),国内学界通常也译作身份认同,本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初是指一种防卫机制(Bloom, 1990: 25—53)。在社会学中,西方学界提出了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等概念,虽然界定不同,但大体上指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对自身同一性的意识或内在界定(陈午晴, 2002)。认同还有“认可”的涵义,如科尔曼(科尔曼, 1990)提出了7类认同: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笔者认为,认同最根本的涵义是对自我的界定,即自我认同,而自我又只能在社会关系当中完成自我界定,这就类似于托马斯(W. Thomas)的“情境定义”与库利(C. Cooley)的“镜中我”。

基于此,本文将自我认同界定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失地农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对自我归属的倾向、对自我现状的感知等几个维度,每一个维度设计3—4个人评价和感受作为指标,采用利克特五点式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测量。

主要的自变量包括时间和相对剥夺感,前者主要指征地时间,后者主要包括对于拆迁补偿政策是否公平和进城后收入是否合理的判断。此外,自变量还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教育程度、收入、就业状况等经济地位特征;网络规模(size)、关系紧密度(density)^①等社会交往特征和社区环境等空间变量。

(三)抽样与样本资料

本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南京市浦口区和江宁区的失地农民。实际上,我国城市征地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安置了工作的失地农民被称为“农转工”人员,没有安排工作的被称为“农转居”人员。此外,由于城乡分治,“农转非”也产生了一些失地农民,但并非城市化的直接后果,不在本项研究之内。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近年来的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一般具备以下特征:(1)失去土地;(2)失地由城市化引起,并非其他原因,如自然灾

^① 这两项数据由本课题的另一项研究——“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中有关关系网络的数据计算得来。

害; (3)被动城市化,土地是被政府征用,并非自己流转; (4)城市定居,应该具备城市户口。浦口区位于南京市西北部,区域范围包括珠江镇、泰山街道等 8 个镇、4 个街道,2003 年底全区的农业人口总数为 21.3 万人。江宁区位于南京市东南部,区域范围包括东山街道、禄口镇等 13 个镇、7 个街道,2003 年底全区农业人口 33.6 万人。作为南京的新市区,近年来,浦口区和江宁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园、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建设发展很快。以浦口区为例,2002 年至 2003 两年共征用农村土地 1.65 万亩,失地农户 6147 户,完全失地 4667 户,房屋被拆迁户 2418 户,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3 月全区新增被征地农民 8000 多人。江宁区的房地产和工业园建设起步较早,农民失地时间相对较长。南京先后出台了 two 套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既有按照 2000 年标准执行补偿的失地农民,也有按照 2004 年新标准执行补偿的失地农民,从被征地时间来看,以前者为主。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 4 个因素,在样本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异质性、精确度、分析内容多寡、分析方法和经验性判断等需要(风笑天, 2001: 145—147)。整个调查均采用结构式问卷,实地调查工作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的课题组,于 2004 年 12 月到 2005 年 1 月期间,分别在浦口区泰山街道铁桥小区、红太阳建材城、服装厂和珠江镇劳务市场、批发市场及沿江镇东苑小区、江宁区红桥小区及周边小区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 583 份,有效问卷 56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5%。样本分布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N=561)

		频数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	235	41.9	—	—
	女性	326	58.1		
年龄	20岁以下	5	0.9	39.02	10.569
	21—30岁	129	23.0		
	31—40岁	204	36.3		
	41—50岁	150	26.8		
	51岁以上	73	13.0		

续表 1

		频数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155	27.7		
	初 中	264	47.1	—	—
	初中以上	142	25.2		
就业状况	就业	363	64.6		
	无业	173	30.9	—	—
	离退休	25	4.5		
收入水平	250 元以下	135	24.1		
	251— 500 元	115	20.5		
	501— 750 元	114	20.3	805.12	1436.9
	751— 1000 元	110	19.6		
	1001 元以上	87	15.5		
征地时间	12 个月以下	15	2.7		
	13— 48 个月	202	36.0		
	49— 84 个月	218	38.9	61.35	44.361
	85— 120 个月	48	8.5		
	121 个月以上	78	13.9		
政策公平度	非常公平(赋值 1)	12	2.1		
	公平	151	27.0		
	一般	188	33.5	3.10	.919
	不公平	187	33.3		
	非常不公平	23	4.1		
收入合理度	非常合理(赋值 1)	4	0.8		
	合理	146	26.0		
	一般	64	16.7	3.39	.997
	不合理	264	47.1		
	非常不合理	53	9.5		

三、结果呈现与初步分析

(一)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现状及对中心假设的检验

在本次调查所设计的量表中, 如下指标涉及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 见表 2。

表 2 大致表明, 调查对象中, 42.8% 的不认为自己是城市人, 56.7% 的人认为征地后生活改变了很多, 55.9% 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

村人, 49.9%的人愿意成为城市人。虽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被调查的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大致倾向, 但指标较多, 且相互之间存在相关, 造成信息重叠, 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 必须对其进行精简, 保留最有代表性且概括力较强的几个指标, 它们之间彼此独立, 以此简化分析。据此需要, 我们对这 13 个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 2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量表

项 目	非常同意	同意	说不清	不同意	很不同意
1. 我已经是城市人了	3.9	33.3	15.2	42.8	4.8
2. 和征地前相比, 我变了很多	5.3	56.7	8.9	28.3	.7
3. 农村人和城市人没有什么区别	1.2	33.3	4.2	54.0	7.3
4. 农村还是和城市有很大差别的	13.5	70.2	2.9	12.8	.5
5. 从生活方式等上看, 我还是典型的农村人	4.7	55.9	11.8	26.2	1.4
6. 既然在城市, 就要适应城市生活	3.9	75.5	7	13.1	.5
7. 我现在已经适应城市生活了	1.5	56.6	12.1	28.4	1.4
8. 城里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7.8	69.7	9.4	12.8	.3
9. 我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来自农村的	5.1	82.7	4.9	7.1	.2
10. 我非常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	3.2	56.5	15.2	24.3	.8
11. 如果有可能, 我会尽力留在城市的	6.1	55.3	13.8	23.9	.8
12. 我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	7.4	49.9	19.1	22.0	1.5
13. 我现在生活过得很舒适	3.0	41.2	9.1	41.0	5.6

指标 4 和指标 5 计分方向与整个量表相反, 在分析之前先对其进行正向计分。^① 然后对这 13 个指标进行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 一般认为该值在 0.5 以下就不适合作因子分析, 这 13 个指标的 KMO 值为 0.726, 巴特利特球状检验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的卡方值为 1091.585, 自由度为 66, 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这 13 个指标适

① 本文的赋分方式为: “非常同意”赋+2分, “同意”赋+1分, “说不清”赋0分, “不同意”赋-1分, “非常不同意”赋-2分, 得分为正倾向于城市, 为负倾向于农村, 以此来简化分析。本文还曾尝试另一种赋分方式: “非常同意”赋1分, “同意”赋2分, “说不清”赋3分, “不同意”赋4分, “非常不同意”赋5分, 得分越低越倾向于城市, 越高越倾向于农村, 中间性态度为3分。对比发现, 前一种计分方式更能清晰地反映出态度的倾向, 也更有利于后文的分析。

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3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因子摘要表

指 标	提取因子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1. 我已经是城市人了	—	.660	.498
5. 从生活方式等上看, 我还是典型的农村人	—	.785	.628
7. 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	—	.736	.586
10. 我非常愿意和城市人打交道	.728	—	.532
11. 如果有可能我会留在城市	.854	—	.760
12. 我非常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	.832	—	.710
新因子命名	未来归属倾向	目前身份判断	
特征值	2.426	1.288	
方差贡献率	34.495%	27.408%	
累积方差贡献率	61.903%		

说明: 1.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3 iteration.

2. 为使图表简洁明了, 因子负荷量的绝对值小于 0.01 在本表中没有标明。

表 3 的结果表明, 6 个指标被概括为两个因子, 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的内容, 分别命名为未来归属倾向因子和目前身份判断因子。指标的共同度除一个接近 0.5 以外, 其余都在 0.5 以上, 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1.903%, 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表 4 因子得分函数系数

	提取因子	
	未来归属倾向	目前身份判断
1. 我已经是城市人了	.020	.395
5. 我不是农村人	-.189	.538
7. 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	-.014	.452
10. 我非常愿意和城市人打交道	.377	-.097
11. 如果有可能我会留在城市	.420	-.027
12. 我非常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	.415	-.051

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函数系数(见表 4)为权数, 计算因子

得分;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自我认同的综合得分。我们采用负值和正值赋分的方式,每一指标的分值是在 $[-2, 2]$ 区间的取整变量,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2,最小值为-2,即该指标对因子的贡献率为100%。两个因子共包括6个指标,因子得分区间理论上应该为 $[-12, 12]$ 。自我认同包括两个因子,综合得分区间也应该为 $[-12, 12]$ 。因此,如果因子得分为正值,则表明在态度上倾向于城市;值越大,倾向越明显,态度越强烈。如果因子得分为负值,则表明在态度上倾向于农村,绝对值越大,倾向越明显,态度越强烈。如果因子得分为0,则表明没有明显倾向或态度不明朗(见表5)。

表5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均值、中位值、众值和标准差

	未来归属倾向	目前身份判断	自我认同
均值	.5461	-.1780	.1396
中位值	.6530	-.2770	.1727
众值	1.41	.13	.52
标准差	.93698	.98288	.42255
最大值	2.83	-2.74	1.26
最小值	-1.48	-2.95	-1.05

表5表明,调查对象未来归属倾向均值为0.5461,大于0,说明被调查的失地农民自我归属总体上倾向于城市。目前身份判断均值为-0.1780,小于0,说明被调查者的失地农民目前在身份判断上总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倾向相对较弱。总体自我认同均值为0.1396,说明失地农民自我认同总体上倾向于城市,绝对值较小,倾向也相对较弱。

若以未来归属倾向为X轴,正向一端为城市,负向一端为农村,以目前身份判断为Y轴,正向一端为城市人,负向一端为农村人,以0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系,561个调查样本就会落入相应的象限。第一象限为未来归属倾向于城市,目前身份判断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第二象限为未来归属倾向于农村,但目前身份判断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第三象限未来归属倾向于农村,目前身份判断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第四象限未来归属倾向于城市,目前身份判断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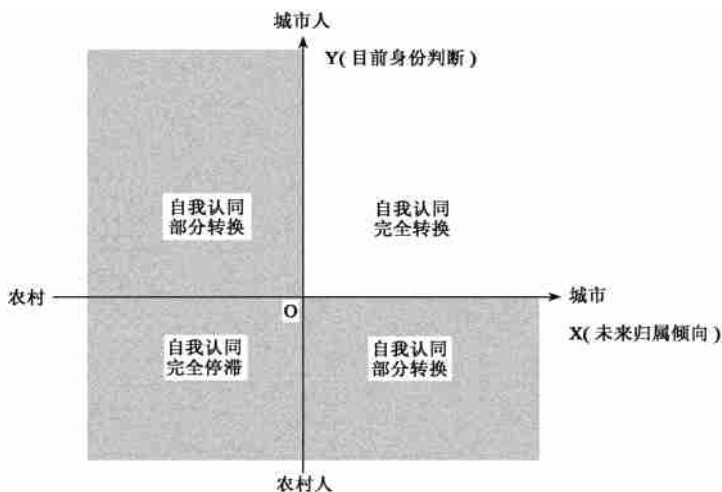


图 2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现状

由于已经永久性失去土地，失地农民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他们已经具备了城市市民的制度性身份，惟一的出路就是融入城市，尽早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就此而言，未来归属倾向于城市、目前身份判断为城市人的调查对象既认同了现有的制度性身份，也愿意积极融入未来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归属倾向和目前身份判断和现实一致，自我认同的转换已经完成。未来归属倾向于农村、目前身份判断为农村人的调查对象既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制度性身份，同时也不愿意接受未来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归属倾向和目前身份判断脱离现实，自我认同完全停滞在过去的地方。居于这二者之间的其他调查对象目前身份判断和未来归属倾向不一致，他们或者接受现在制度性身份，但并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城市生活；或者已经接受了现在的城市生活，但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制度性身份，这部分调查对象自我认同部分实现了转换。如图 2 所示。

按照程度的不同，我们依次将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现状分为良好、紊乱和不良。第一象限为自我认同良好，第三象限为自我认同不良，第二、四象限为自我认同紊乱。第一象限，调查对象的自我认同在城乡两个维度上保持了一致；第二、四象限在城乡两个维度上是对立的，无法达到内部一致性；第三象限虽然内部一致，但是和现实对立的。由于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缺乏弹性，因此，可以将处于第二、三、四等三个象限的调查对象统称为自我认同失调，如图 2 阴影部分所示。

进一步对未来归属倾向和目前身份判断作交互分析(见表6)表明,落入第一象限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为33.5%,落入第三象限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为17.1%,落入第二、四象限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为49.4%。这表明,自我认同良好的调查对象仅占1/3,自我认同失调的调查对象占2/3,即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自我认同失调。

表6 未来归属倾向与目前身份判断的交互分析

		目前身份判断		合计
		农村人	城市人	
未来归属倾向	农村	17.1%	10.7%	27.8%
	城市	38.7%	33.5%	72.2%
合计		55.8%	44.2%	100.0%

至此,本项研究的中心假设——“自我认同失调假设”已基本得到证明,即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和现代性获得过程中,自我认同缺乏心理过渡和弹性,导致自我认同失调。

(二)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对“时间性”和“空间性”作用机制的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被动城市化所带来的时间延宕效应、相对剥夺效应对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作用机制,以及个体特征、经济地位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等变量对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影响,我们采取分步多元回归技术:第一步自变量为性别、年龄,以考察个体特征对自我认同的影响。第二步加入教育程度、收入与就业水平三个自变量,以考察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失地农民经济地位特征对自我认同的影响。第三步加入网络规模和关系紧密度两个自变量,以考察在控制了失地农民个体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后,社会交往特征对自我认同的影响。第四步加入征地时间、社区环境两个变量,以考察在控制了失地农民个体特征、经济地位特征、社会交往特征后,时间空间变量对自我认同的影响。第五步再加入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两个变量,以考察在控制了失地农民个体特征、经济地位特征、社会交往特征和时间空间特征后,相对剥夺感对自我认同的影响。最后两步,实际上也是检验被动城市化的两个作用机制的过程。具体结果见表7。

表 7 失地农民自我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① (Beta 值)

	自变量	未来归属倾向	目前身份判断	自我认同
第一步	个体特征			
	性别	—	—	—
	年龄	—	-.285***	-.195***
	R ²	.003	.072	.031
	F 值	.518	14.144***	5.867***
第二步	个体特征			
	性别	—	—	—
	年龄	—	-.161**	-.084
	经济地位特征	—	—	—
	教育程度	—	.209***	.150**
	收入	—	.173***	.149***
	就业状况	-.105!	—	—
	R ²	.017	.136	.081
	F 值	1.504	13.858***	7.777***
第三步	个体特征			
	性别	—	—	—
	年龄	—	-.143**	-.042
	经济地位特征	—	—	—
	教育程度	—	.239***	.188***
	收入	—	.170***	.162***
	就业状况	-.109!	—	—
	社会交往特征	—	—	—
	网络规模	—	—	—
	关系紧密度(密切关系)	—	—	—
	R ²	.023	.145	.089
	F 值	1.414	10.109***	5.820***

^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对未来归属倾向的回归效果不明显,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主要关于目前身份判断的回归分析,为了有效避免此问题,本文采用了如下技术处理:首先,对所有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未来归属倾向效果不明显,调查对象在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大部分的调查对象倾向于城市;随后,只选择了未来归属倾向为城市的样本(交互分析显示占总样本量的 72.2%)进行回归分析,即本表所显示的结果。这样可以很好解释自变量对认同失调的影响。即根据本表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这部分(占大多数)自我归属于城市的调查对象中,相对剥夺感越强,他们越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自我认同越失调;征地时间越短,越认为自己是农民,自我认同也越失调。

续表 7

	自变量	未来归属倾向	目前身份判断	自我认同
第四步	个体特征			
	性别	—	—	—
	年龄	—	— . 178 ***	— . 072
	经济地位特征			
	教育程度	—	. 233 ***	. 181 ***
	收入	—	. 158 ***	. 150 ***
	就业状况	— . 106!	—	—
	社会交往特征			
	网络规模	—	—	—
	关系紧密度	—	—	—
	时间空间变量			
	征地时间	—	. 129 **	. 125 **
	社区环境	—	— . 151 ***	— . 139 **
	R ²	. 029	. 175	. 116
F 值	1. 414	9. 859 ***	6. 115 ***	
第五步	个体特征			
	性别	—	—	—
	年龄	—	— . 185 ***	—
	经济地位特征			
	教育程度	—	. 146 **	. 114 *
	收入	—	—	—
	就业状况	—	. 098 *	—
	社会交往特征			
	网络规模	—	—	—
	关系紧密度	—	—	—
	时间空间特征			
	征地时间	—	. 119 **	. 118 **
	社区环境	—	—	—
	相对剥夺感			
	政策公平度	—	— . 335 ***	— . 273 ***
	收入合理度	—	— . 143 **	— . 137 **
R ²	. 037	. 331	. 231	
F 值	1. 402	17. 849 ***	10. 816 ***	

说明: ! P < 0. 10; * P < 0. 05; * * P < 0. 01; * * * P < 0. 001; 统计分析结果中检验不显著的 Beta 系数均未列出。

如表 7 所示,线性回归的第一步是以未来归属倾向、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为因变量,年龄、性别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R^2 分别为 0.003、0.072、0.031,说明三个方程消减的误差都在 10% 以下,模型拟合度差。线性回归第二步加入了经济地位变量, R^2 分别为 0.017、0.136、0.081,消减误差的比例在提高,模型拟合度仍然较差。第三步、第四步分别加入了社会交往变量和时间空间变量, R^2 分别为 0.023、0.145、0.089 和 0.029、0.175、0.116,误差消减比例逐渐提高,模型拟合度仍然不理想。第五步加入了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两个变量, R^2 分别为 0.037、0.331、0.231, F 值 1.402、17.849、10.816,其中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两个方程消减误差比例达到 33.1% 和 23.1%, F 检验在 0.000 水平显著,模型拟合度属于中等水平。

就三个因变量各自的模型来看,未来归属倾向几乎不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就业状况起初有微弱的显著性,但在加入了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两个变量之后,影响消失,这可能由于调查对象在未来归属倾向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大部分的调查对象未来情感都倾向于城市,以致当前的样本量显示不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所以下文只讨论自我身份认知和自我认同的回归模型。

就各个自变量的影响来看,“年龄”一直对目前身份判断有明显的影响,即年龄越小,调查对象越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文化程度”一直对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都有明显影响,即文化程度越高,调查对象越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自我认同越倾向于城市。“收入”起初对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都有明显的影响,但在加入了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两个测量相对剥夺感的变量后,收入的影响消失,这说明对于收入的主观感受比客观的收入更能影响调查对象的自我认同。“征地时间”一直对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都有明显的影响,即征地时间越长,调查对象越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自我认同越倾向于城市。“社区环境”起初对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都有明显的影响,但在加入了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两个变量后,社区环境的影响消失。“政策公平度”和“收入合理度”对目前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都有明显影响,即政策越公平、收入越合理,身份判断越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自我认同越倾向于城市。

综合来看,对调查对象自我认同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分别是政策公平度(-0.335、-0.273)、收入合理度(-0.143、-0.137)、教育程度

(0.146、0.114)、征地时间(0.119、0.118);此外,年龄(-0.185)对目前身份判断有明显影响,就业状况(0.098)对目前身份判断有微弱影响。

可见,相对剥夺感和征地时间都是影响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主要因素。相对剥夺感越强,失地农民自我认同越倾向于农村,越难实现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征地时间越长,失地农民自我认同越倾向于城市,越容易实现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至此,本文的两条作用机制假设——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和现代性获得中的“时间性”假设和“空间性”效应假设基本得到证明。此外,由于失地农民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任何将自我归属于农村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也从侧面表明被动城市化下的自我认同缺乏弹性。

四、总结与讨论

第一,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过程中自我认同失调,自我认同无法达到内部的一致性。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大部分失地农民对自我传统身份的判断与未来归属倾向不一致,其直接原因在于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而其更本质和深层的原因则需要我们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社会结构层面予以分析和认识。城乡二元分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双轨制等独特制度性安排及变迁的社会实践背景,使得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流动农民,传统的清晰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他们既不同于传统农民,又有别于现代的市民,他们到底是谁?未来怎样?“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吉登斯,1998:6)。失地农民内心中自我的边缘化是可以预见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4.5%的调查对象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认同失调所导致的焦虑与不安溢于言表。

当然,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进城的也不只是失地农民,流动农民是否也会认同失调,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较之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主动城市化,这场被动城市化来得太过猛烈迅速和别无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失地农民都拒绝城市化,他们只是来不及思考和没有退路。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今天的被动城市化所带来的户籍远没有那时的城市户口有吸引力。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认为户口一点也

不重要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为 50.1%，超过一半。城市户籍曾经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让农民们梦寐以求，有了它就意味着有工资的稳定生活、可靠的住房福利和子女入学入托的便利等等；而现在，城里人纷纷下岗，城市贫民的生活都不如农民，城市户口与住房、工资等的福利关系渐疏，于是在农民的眼中，它们理所当然地贬值。

第二，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和现代性获得过程中的社会参照系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即是实践主体对当时当地社会实践的感知与认同。被动城市化产生了“时间性”效应和“空间性”效应。

“时间性”效应很容易理解。国外的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的融合要经过定居(settlement)、适应(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三个阶段(Sauvy, 1966: 460—461)，这是一个漫长的融入过程。以此而论，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失地农民处于定居阶段，还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才可能达到认同和融入。“空间性”效应的发现则值得深入探讨。失地农民在获得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过程中，感受到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影响了自我认同达到内部的一致性。

相对剥夺感是影响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39%的调查对象认为征地后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6.5%认为改善了很多，31.2%认为没有变化，21.5%认为变差了，1.8%认为变差了很多。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或者基本能保持不变，但并没有因此更认同城市和更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可见影响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拿多少钱，干什么工作，生活改善了多少，而是他们的社会参照系。失地农民的社会参照系并不是自己的过去，而是自己的现在。他们是以自身当时当地“失地”、“进城”的社会实践及其与周围的他群体和我群体的人的社会生活境遇相比较而衡量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生活是否令人满意。失地农民的周围生活着两类人，一是作为他群体的城市人，二是作为我群体的失地农民。和城市人相比，他们虽然拥有了一样的身份，但收入却低得多，也享受不到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同样的身份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他们还是农民，他们会承认、容忍这种差别，但他们被迫做了城市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差别”？更重要的问题是，相对剥夺感来自于与我群体的其他失地农民的比较，“为什么也会有此差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关政策的社会运作不一致是一个诱因。如安置补偿政策的不统一，导致作为我群体的失地农民内部分

享补偿的差别较大因此而多有怨言。以南京市为例,新近失地的农民无论是补偿项目还是补偿标准,都高于早期失地的农民,这让后者异常不满,也成为当地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此外,我们所做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主要受政策公平度、收入合理度和征地时间的影响。而从已有的一些相关经验研究结果看,地区差别、属地管理的差别等因素也是导致失地农民自我认同失调的结构性的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尚待进一步检验的一个命题,即“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其社会参照系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

第三,前文的分析显示,在调查对象中,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较高的失地农民,在身份上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对于他们而言,土地的记忆和城市的陌生并没有那样尖锐的对立。因为,与其父辈及80年代主动选择向城市流动的那一代农民不同,他们年龄较小而教育程度较高,乡土社会生活时间短、经历简单,对乡土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乃至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等的认同疏淡。有研究曾提出“新生代”的命题,用以指征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土地感情趋淡、乡土认同减弱、愿意认同流入地生活的一代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并认为教育和年龄变量对该群体乡土认同疏淡存在相关关系(王春光,2001)。我们发现,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与“新生代”命题所揭示的教育及年龄与认同倾向的关系有类似性,即我们所作的相关回归分析表明,教育及年龄也是影响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自我认同就越倾向于城市;年龄越小,愈易倾向于认同城市生活。

第四,失地农民到底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大部分失地农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为农民。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如此判断?根据此项调查,我们认为被动城市化所带来的时间延宕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思路。既有的一些观点可供借鉴,但需要进一步验证。

一般观点认为,户口等制度性障碍是阻碍农民成为市民的主要因素(朱力,2002)。这种观点显然不太适用于失地农民。不过,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到底是因为失地农民有了户口而显得户口不重要呢?还是户口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有研究认为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其社会记忆和社会时空的巨大变化,已经使他们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了错位(王春光,1995,2001)。而我们的此项研究发现,户口固然是一种身份转换的制度屏障,但是,对失地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被

动城市化过程中,其社会记忆和社会时空所发生的断然变化——这一变化是以自上而下的、不容对话的、被动适应的方式展开的,从而使得其制度性身份与实际身份不仅发生了错位,而且是断裂性的错位。这种断裂性的身份转换的错位,迫使失地农民在“集中安置”的社会情境中,其社会互动与认同的视域被限制在同群体内而失去现代性取向选择的异质性参照物及其实践机会。由于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失地农民,在如此社会时空下,他们的社会记忆将会强化并比较长久地停留在以往农村社会生活的场景之中。失地农民大多是集中安置,一般仍处于城乡结合部,多有长期的务农经历,而少城市生活体验;彼此经常性地交换和仰赖着的是“手边的”、熟悉的乡土生活经验,并且不断地重复使用着这些早已溶入血脉的既有的经验性知识,固化着乡土经验及其认同的社会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的现代性的知识学习与经验积累及其对于城市社会文化的认同严重受挫。

第五,虽然对于自我的界定来源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但失地农民现实的社会交往对自我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失地农民的同质性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尚未建立起来有关。失地农民原有的地缘、亲缘关系被割裂,新的业缘关系尚不能经有效途径建立起来,异常缺乏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交往及其对象。此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大多忙于应付进城后的生计维持,几乎没有时间与异质性人群交往。

参考文献:

- 查尔斯·泰勒, 2001,《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 陈立新, 2004,《论土地征用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求索》第2期。
- 陈午晴, 2002,《关系认同的外在效应》,台北: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论文, <http://www.ioe.sinica.edu.tw/dinese/t2711/oldfiles/911109/paper/paper.htm>
- 成得礼、董克用, 2004《城乡结合部(北京市)“失地农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科学》第4期。
- 风笑天, 2001,《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葛金田, 2004,《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山东社会科学》第8期。
- 韩俊, 2003,《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界定为按份共有制》,《中国经济时报》,11月11日, <http://www.cet.com.cn/20031111/YAOWEN/200311111.htm>
- 贺金花, 200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调查与思考》,《浙江学刊》第4期。
- 吉登斯, 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康少邦、张宁等, 1986,《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科尔曼, 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一平, 2004,《城市化进程中杭州市近郊失地农民生存境况的实证调查和分析》,《杭州市委党校学报》第2期。
- 孟德拉斯, 1991/1984,《农民的终结》, 李培林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帕克等, 1987,《城市社会学》, 宋俊岭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田凯, 1996,《关于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人口学刊》第4期。
- 托马斯·兹纳涅兹基, 2000/1918《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张友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汪晖, 2003,《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用权与征地补偿》,《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王春光, 1995《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心理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英格尔斯, 1992,《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个人的变化》, 顾昕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翟学伟, 2003,《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汝立, 2004,《从主动边缘化到被动边缘化——农转工人员进城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 浙江省人民政府课题组, 200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 朱力, 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第6期。
- 朱明芬, 2004,《浙江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现状调查及对策》,《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Bloom, William 1990,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dfield, R.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uvy, Alfred 1966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宛丽

Abstract: Class advantage inheritance has been detected as a main and universal mobility regim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alysis over past decades. Data collected from a transition society of China has also proved the same mobility pattern. The author argued that industrial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logic which has ever dominated Western mobility researches did not give any sounda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n this paper,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this universal mobility features has been launched from two aspects: reproduction and dominance mechanism.

Social Capital and Villagers' Local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 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Hu Rong* 61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1 survey data of Shouning and Xiamen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sex, age, party membership and cadre status influenc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only association factor and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factor in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 to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while social trust factor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village elections influence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The paper shows that,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villagers to voice their interests in local community affairs now, so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 can be labeled as "local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

Self-identity of the Passive-urbanized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Urban Adaptability and Modern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561 land-displaced peasants in Nanjing *Zhang Haibo & Tong Xing* 86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61 land-displaced peasants in Nanjing in 2004, from perspective of self-identit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land-displaced peasants are experiencing self-identity maladjustment. Most of them haven't attained their self-identity in the new system, because their self-identity transitions lag overly behind their physical migration and strong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consequence of passive urbanization that they have encountered. The longer the peasant's land is displaced, the easier their self-identity is transitioned. It means "Time Effect". The stronger they feel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harder they achieved self-identity transition. It means "Place Effec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proposition yet to be further proof-tested — the social reference frame/system of self-identity of the passive-urbanized group is taking on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es.